

1978年，是路遥的大喜之年——那年1月25日，他与林达结婚。也在这一年，李星正式调入陕西省作协。从此，两人共事14年。

“路遥不断以超乎常人的勇气，一步一步地建构自己非凡的人格形象。尽管生命短暂、急促，但他成功了。”忆及往事，李星慨叹。

1978年，路遥完成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遭多家杂志社退稿后，最终发表于《当代》1980年第三期。这篇小说后来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由此成为全国知名作家。

李星“深信路遥已经在创作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也坚信他以后必将以更加坚定的步伐走出自己的新的路”，在第一时间发表了《艰苦的探索之路》(1981年6月23日《文艺报》)。这是当时最早介绍路遥及其著作的文章。

1982年，路遥的小说《人生》在《收获》第三期发表，李星撰文《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深层次、多角度阐释路遥小说的魅力。

1988年12月，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甫问世，李星就接连撰写了上万字的评论文章《无法回避的选择》《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论述路遥的人生道路和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李星说，有很长一段时间，读者认为高加林是“于连式”人物，但在路遥眼里，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奋进者。李星透露，《人生》问世后，与高加林有着类似命运的莫言读后深受触动，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信，与路遥探讨高加林的命运。

“作为同事，我见证了《人生》写作、发表前后，路遥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的努力和不被承认的失败感，更见证了《平凡的世界》在当时中国文坛及文学界，特别是批评界所遭遇的普遍的

“人生”的重托

——李星忆路遥生前嘱托兼述文坛往事

魏锋



▲《路遥小说选》签名本
▶李星先生接受本文作者采访

失望和冷淡……”平息了一会儿情绪，李星继续说：“路遥是执拗的，可以说，当时他几乎是与整个文学界在抗衡，他要贯彻文学的现实主义。”

路遥很尊敬也很信服李星对自己作品的评论。1991年3月10日，《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0月18日，路遥专门为李星撰写了《懂得生活的评论家》，文中说：“他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使被批评者和读者信服，正在于此：这个人无论对重大问题还是对一般的艺术观点，都力求认真钻研以至透彻理解，而不是那种号称博览群书其实常常一知半解，最终只能用模糊语言写评论的评论家。”

1992年7月中旬，路遥找到李星，说中国文学社要出版《人生》英文版，请李星写序。

8月6日，李星在作协院子里锻炼身体，不经意间瞧见路遥

手提简单的行李行色匆匆，忙问他去哪里。“回去，回陕北去。”路遥放缓脚步答了一句，又急匆匆地走了。

一星期后，李星却听闻路遥在延安病了的。当时也没多想，便托王观胜带去书信，劝路遥多休息，最好回西安治疗。

9月上旬，得知路遥病情加重转院至西京医院，李星匆忙赶去，满以为能看到一个在病房散步的路遥，可眼前的路遥让他惊呆了：脸颊消瘦黝黑，昔日粗壮的胳膊很细……

路遥很乐观，热情招呼李星和一起来的同事坐在他身边，讲述起在延安发病的情况、省委领导的关心、医院对治疗的重视，声音不高，但自信有力，他相信自己会好起来。

李星忍不住问，这么重的病为何还要回陕北。

路遥答：“回陕北，我是准备

死在那里。一旦确定癌症，我就躺在陕北的山沟里，用白布把自己一盖，坦然地去死。”

李星忙把话题扯开：“《人生》(英文版)序写好后，你就不用看了吧。”

路遥坚持要看：“让他们捎来，我看看。”

9月底，李星完成《人生》序言《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正犹豫是否给路遥看。在医院看护路遥的诗人远村传话说，路遥精神大有好转，特别希望和朋友们聊聊。

李星赶到医院。为了分散病人的痛苦，李星坐在床边聊起时事与各种社会新闻，路遥的眼睛睁开了——他一直很关心国内外大事，而且常以聪明睿智的分析使人对时事有全新的认识……

过了一会，护士来病房换上血浆。

路遥对远村说：“得吃一点东西了。”“吃啥？”“还吃稀饭。”

路遥就像饥饿的孩子，吃得

不香，但很投入和专注。

一旁的李星实在忍不住，伸手想喂。

路遥头一抬，坚定地说：“不用，我行哩。”

“罢了，我再看看。”路遥让李星把稿子放下。

“李星，你也要保重！”告辞时，李星快到门口时，听到路遥大声的叮嘱。他没想到，这是路遥对朋友最后的叮嘱。

“路遥已逝，但精神仍在。柳青是路遥的文学教父，路遥继承了柳青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展示了社会的、人的历史的现实主义，他与后来另两位陕西文学的代表作家陈忠实、贾平凹的创作有着很大区别。”李星说，一直没能等到路遥对序言的意见。李星和远村交换意见后，11月16日，对序言进行了修改，还未寄出，传来路遥辞世的噩耗。

在《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生〉英文版序》结尾，李星附记：“为《人生》英文版写序的事是今年7月由路遥先生本人转告我的，当时他虽感腹部不适，但外人看来仍属健康。到10月下旬此序草成时，路遥已因肝硬化合并腹水辗转病榻近三月。到此文于前日改定，正准备寄出时，却听到了他于17日病逝的噩耗。他才43岁啊，可恶的病魔！于是此文就有了悼念英才早逝的意义。”

李星补充说，《人生》是中国外文出版社要对外出版，并非英文版或法文版。

为了纪念路遥，1993年6月，李星与晓雷编著《星的陨落》出版；1997年12月，李星与王西平、李国平编著《路遥评传》出版……“可恶的病魔！路遥还不到43岁啊！这篇序言成了我和路遥之间友谊的最后记录。”李星洪亮的声音不再铿锵有力。

费明君(1911—1973)是与鲁迅有过书信往来的译者，据说掌握日、俄、英等多国语言。1949年他由震旦文理学院调华东师大中文系任副教授，讲授外国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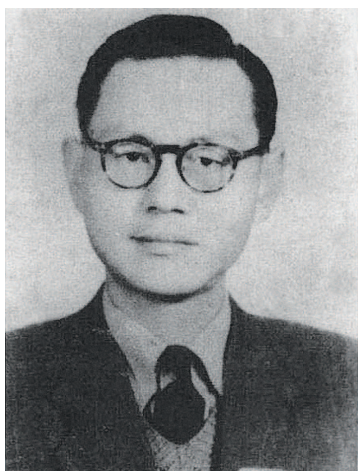
经检索上海图书馆藏书目录及旧书网站可知，费明君名下译著几乎都在抗战胜利后所出。

费明君的翻译方向大体为波兰及俄苏文学经典，且多据日译本转译。兹以出版日期为序，罗列如下：

1. 莱蒙脱《农民》(四部曲)，神州国光社1948年11月初版
2. 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神州国光社1948年11月初版
3. 马克思原著，版本胜编剧《戏剧资本论》，神州国光社1949年4月初版
4. 《唯物史观中国史》，永祥印书馆1949年8月初版，10月校正再版
5. 高尔基《戏剧》《蒲雷曹夫》，长风书店1949年10月初版
6. 高尔基选集《三天》，上杂出版社1949年11月第一版
7. 高尔基选集《监狱》，上杂出版社1950年7月第一版
8. N·G·车尔尼舍夫斯基《做什么？》，神州国光社1950年2月初版，1950年9月泥土社出精装初版
9. 10. 高尔基戏剧全集第九集《华莎·席列兹诺娃(初稿本)》，第十八集《华莎·席列兹诺娃(改编本)》，泥土社1951年3月初版

浅议费明君的译著

祝淳翔



▲费明君留存于世的唯一一张照片

11. A·托尔斯泰《加林的双曲线体》，泥土社1952年1月初版

12. 伊里夫、彼得罗夫《十二把椅子》，泥土社1954年4月初版

注意到1947年，费明君在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杂志发表高尔基小说《书》《动荡》译文，在《动荡》译后记中写道：“关于翻译，依据日本改造社《高尔基全集》第九、十卷，黑田辰男与村田春海的译文重译

的。他们所依据的原本是1927年苏联国立出版所发行的高尔基全集。”日后费明君的多本高尔基译作，或均取自类似版本。

那么，诸多译本质量究竟如何？其中竟有一本险些发生“事故”。

例如《唯物史观中国史》出版后，因错误频现而议论纷纷，出版方请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校正古代和中世两部分(第33至75页)。吕先生编有订正表及《校记》，又另写书评短文《评某著中国史》，举例批评原著的不当之处，并提及译者的责任：“译序云：原著征引中国典籍杂志的地方，译者都尽可能地搜寻原文照录。遇和原文有出入时，便依原文订正。而以予所见，则未曾订正者甚多。”

1952年6月9日，出版总署关于一些报刊对某些出版物提出批评问题给华东新闻出版局的指示里，指出永祥印书馆的出版条件“非常薄弱”，“有不少出版物受过严厉的批评”，其中费明君译《唯物史观中国史》首当其冲，并对该社给出“初步考察意见”，责令其“对于文艺性的出版物必须考虑放弃”。这批评无疑相当严厉。

平心而论，此书的主要问题在选题及

原著。译者并非中国史专家，其责任不如想象中那么大。

但有读者对费明君所译《做什么？》提出的善意批评，则不那么易于推脱：

最近我在看费明君译的《做什么？》(车尔尼舍夫斯基原著)，其中第九章，开头这样译着：“实际上，中国人之间，远不如欧洲人之间的差别，来得更大，和中国人的比较起来看时，正如欧洲人觉得中国人底脸孔是同样的、还有着同样的风俗习惯是完全同样地，被认为只有一种典型的这些近代人之间，也是如此。”再读下去，差不多整个这一章，都充满了类似的“难句”。我问过几个文化较高的朋友，他们也觉得必须多读几遍，才能领略其三。(牧子《看不懂的译句》，《新民报·晚刊》1953.4.22)

读者所指译文，来自该书第三章第九节(第395页)。以之与1998年译林版魏玲的译文比，后者委实容易索解：

欧洲人置身中国人当中，面貌和举止都是一个模样，这仅只对中国人而言，其实欧洲人之间的区别，远非中国人之间的区别所能相比。同样，在这个看似单一的典型中，由个性不同演变而来的差异，要比所有其余各种典型相互间的一切差异更多，也更明显。

翻译领域有后出转精的说法，但牧子举了鲁迅曾被讥为“硬译”却读来笔调流畅的例子。以此为准绳，则费明君不顾教职繁忙，硬是用业余时间将厚厚一本著作扛下来，然而“萝卜快了不洗泥”，致使译文质量出现瑕疵，还来不及修改，总也是事实吧。